

《汉书》较《史记》增加“四志”研究¹

李斐然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汉书》较之《史记》增设了“四志”,即《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历来学界关于史汉对比的研究较多,也有对“四志”中某一志的单独研究,但是把“四志”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现象加以研究的相对匮乏。本文尝试以综合分析的视角,通过对《汉书》产生时的社会环境文献和先秦以来史学发展的相关材料,以及记述班固思想的有关资料进行梳理解读,并整理归纳后世官修史书对“四志”的传承与损益,力图对《汉书》新增“四志”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进行整体把握,从而提炼出《汉书》增加“四志”的学术价值,以期对新时代“汉书学”的发展做一点贡献。

关键词:《汉书》;班固;“四志”;“汉书学”

一、《汉书》新增“四志”的成书过程

我国有源远流长的著史传统,历代史家都以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作为史学的旨归,推动着“以史为鉴”传统的代际赓续。可以说,著史精神的感召,是《汉书》产生的条件之一。

《汉书》的问世更是时势使然。东汉王朝诞生于王莽之乱,光武肇基使汉祚得以延续,明帝时开始进入平稳发展的轨道,整个国家的政治情势呼唤着由武功到文治的转变。这为《汉书》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当时,上至官方,下到民间,刮起一股“续《太史公书》”风潮,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学术自觉和时代情怀。班固之父班彪的《史记后传》亦成书于此时,不仅是后来《汉书》的雏形之一,其中蕴含的“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②的史家精神和学术信念,也在班固的《汉书》中悉数体现。

此外,由于诸家“续《太史公书》”质量良莠不齐、立意参差有别,给当时社会思想局面带来一定混乱。出于巩固统治的根本目的,章帝即位后,发起了白虎观会议,旨在讨论五经异同,弥合学派冲突,重建思想权威。白虎观会议根据儒家经义制定出一套标准和法则,“永为世则”^③,从而形成了一种象征封建秩序法典化、封建思想神学化的意识形态,实际为《汉书》创作确定了“主旋律”,对《汉书》的文本生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汉书》作者班固,出身于扶风安陵班氏。班氏一族经战国至秦汉,实现了从楚之流人到汉之豪族、再到外戚勋贵的身份跃升^④,在东汉一朝具有外戚和儒族的双重身份。出身于这个家族的班固,既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有著史的雄心和学者的强烈责任感。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遭狱厄,幸遇明帝赏识,被任命为兰台令史。这一任命深刻地影响了《汉书》写作性质的改变——由私人撰述转变为官方行为,这也是《汉书》面貌与《史记》不同的根本所在。梁启超指出:“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⑤因此,永平年间的这一转变,常被看作是《汉书》文本形成中的根本性转折,也代表着中国传统“正史”意义上官修史书的开端^⑥。

自此,班固怀着自己的学术理想,更加自觉地以皇权规范下的“润色鸿业”为旨归,正式开始《汉书》的编纂事业:通过对有汉一代历史的收集和记录,实现对从前代至当世的文献材料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起到保存和传承文化资源的作用。这一目的,深刻地体现在了《汉书》的新增“四志”中。

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班固将“完稿”的《汉书》上呈御览。但是史料表明,此次上呈的仅是《汉书》的纪传部分,而直到他去世时,尚有“八表”及《天文志》未完成(后

由其妹班昭和马续补作)。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班固的心目中,纪传是《汉书》的主体,故须郑重对待,上呈皇帝作为“交差”之功,而志、表部分则可从容为之、渐竣其功。其实,恰恰因为《汉书》的表志部分在全书的分量逊于纪传,因而在创作上才具有更大的私人自由度,从而文化和文献价值更高。关于这一点,在“十志”的材料选择与内容编排上有比较明显的体现。

笔者综合相关研究成果^⑦,对“十志”乃至《汉书》的材料来源进行了梳理归纳:班固编纂《汉书》,除采纳《史记》、《史记后传》、诸家“续《太史公书》”、向歆父子著作等前人精华外,还广泛参考了朝廷原始档案谱牒、西汉子书和辞赋文章,甚至还大量收罗前世轶事和当代见闻,素材来源共有九类之多。

对于这些材料的处理,班固既沿袭《史记》的编纂体例,又根据具体情况而小作改变。其中,为避免与《汉书》之“书”名混淆,而将《史记》中的“书”改为《汉书》中的“志”,这是一大亮点。

不仅如此,班固还对《史记》“八书”进行了诸多损益与创新,笔者以表格形式列于下方^⑧,以便对照:

《史记》“八书”	《汉书》“十志”
《礼书》第一	《礼乐志》第二
《乐书》第二	
《律书》第三	《律历志》第一
《历书》第四	
《天官书》第五	《天文志》第五
《封禅书》第六	《郊祀志》第五
《河渠书》第七	《沟洫志》第九
《平准书》第八	《食货志》第四
无	《刑法志》第三
	《五行志》第七
	《地理志》第八
	《艺文志》第十

由上可见,《汉书》“十志”中,有“六志”与《史记》“八书”对应,可谓一脉相承。当然,班固对之有所改动:合《礼书》《乐书》为《礼乐志》,合《律书》《历书》为《律历志》,改《天官书》《河渠书》《平准书》《封禅书》为《天文志》《沟洫志》《食货志》《郊祀志》。其中,《礼乐志》《律历志》内容完全重写,前者不但记载了汉初叔孙通以下关于制礼的重要言论,还收录了汉初的郊庙诗歌《安世房中歌》十七首和武帝时的乐府歌曲《郊祀歌》十九首;后者则记载了音律和度、量、衡单位的指定,以及历法的演变。除此之外,《郊祀志》中续载了昭、宣以后帝王的封禅祭祀活动,借以批评统治者的迷信思想,并记载

了谷永等人谏议废除淫祀的进步言论，这些是难能可贵的。

最重要的是，刑法、地理、五行、艺文“四志”乃是《史记》所无，当为《汉书》新创。这就表明，在《汉书》写作过程中，班固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程度不断加深。新增“四志”的出现，不但增广了官修史书的内容范围，而且体现了班固在学术上的一种自觉探索。在此，对“四志”作一简要介绍：

《刑法志》作为第一篇专门研究刑罚制度沿革的专论，对法律的起源、司法制度的沿革、历史上重要法律事件，以及刑法与军事的关系等问题都做了相当全面的叙述和评析。时间范围起于上古，下到东汉，可谓打通古今。

《五行志》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春秋》三传、京房《易》学与《洪范五行传》，其解说主要来自于董仲舒、京房、刘向刘歆父子几家，也有部分内容系班固自行解说。作为“经学神学化”时期文化思潮与政治风波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五行志》记载了大量灾异事件，并配以政治化解说，体现了西汉董仲舒以来阴阳五行学说体系化的进一步发展。不过，班固深知，倘若一味纂集前人学说，未免有虚张声势之嫌，且未免偏离《汉书》编纂的本意。所以《五行志》中不乏对阴阳灾异家的批评：“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设计议，依托象类，或不免乎‘臆则屡中’”^⑨，深刻指出阴阳灾异家的共同特点是牵强附会、阿谀谄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班固重人事的思想。他创立《五行志》的目的是要遵循《洪范》大法、《春秋》大义，以此来彰显王道，实现“究西都之始末，穷刘氏之废兴”的著书初心。

《地理志》详细讲述了自三代以至秦汉的国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行文结构严密，练词雅洁，深合“古文法度”，形成了历史地理学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良好配合，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不仅如此，《地理志》中还蕴含着班固对于“边疆-中原”关系的独到认识。比如关于乐浪、玄菟地区文化风俗的记载，通过“夷人夏则夏，夏人夷则夷”体现了与传统夷夏观迥然不同的疆域思想，反映出政治势力影响下文化风俗的嬗变。班固还借阐述齐学和鲁学之争，揭示齐鲁大地由于经济发展导致学风民俗不同的现象，深刻反映出权力操纵下的学术流变，也借机证明了汉代官方学术源于齐鲁正统。

在《艺文志》中，班固将自古以来的典籍进行整理，共计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并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共六大类，每一大类又区分为若干种，共三十八种，并在前面的“总序”中，交代了西汉以前的简明学术史、目录学史和文献学史，说明向歆父子整理秘书的过程和分工，还有刘向《别录》^⑩和刘歆《七略》的分类体系，以及《艺文志》与《七略》的因袭关系。此外，《艺文志》还在每一略之后以“总序”综合评论各略要旨，每一家之后以“小序”说明每家内容得失及学术源流，具有重要的学术史和文献学价值。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在《诸子略》中将先秦诸子百家确定为九流十家¹¹，这是有意识地对先秦学术所作的一次归纳总结。

由此可见，《汉书》新增“四志”系服膺于权力规范下的政治写作，其中隐含着的一套与表层符号并行不悖的独特的话语体系，蕴含着班固作为史家和儒者独有的价值观与判断力。可以说，班固广泛收集、精心整理存世文献，然后字斟句酌、条分缕析地进行汇编和改写，力图使新增“四志”的每一部分都彰显君主意志。它的创立，不仅是官修史书体制方面的重大创新，更体现着一种全新的文化书写模式的成熟，对后世的史书创作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二、新增“四志”的深层意蕴探究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专制主义确立并不断强化的时代。东汉王朝建立后面临着更复杂的思想局面，为此，统治者对文人思想的钳制力度更甚于前。对于几乎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班

固而言，首先需要配合皇权制定的文化政策以明哲保身。体现在《汉书》的写作体例上，则是继承了《史记》的总体布局而取消世家、改书为志，这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战胜旧的割据势力这一崭新的时代特点。然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作为学者的班固亦把著史视为名山事业，因此《汉书》在沿袭《史记》的基本著述手法的同时，比之《史记》新增的“四志”，则更多地呈现出班固心目中的汉代史，体现了他个人对于经世治国的理念认识。以下分而述之。

在《刑法志》中，班固“不为汉讳”¹²，指出汉朝在立法、执法上积弊严重，刑狱不平早已成为国家达到政治清明的一大障碍，体现了虽“宣汉”却不盲从的史家风骨。他总结道：从西汉立国到东汉初年的二百余年里，据有案可查的数字，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中，每年判处死刑的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一，判处长期监禁至砍去右脚趾一类重刑的，竟达千分之三以上。直至东汉初年，每年被判处死刑的数以万计，全国的监狱多达两千多所，冤死之人更是不计其数¹³。虽然汉明帝决心整饬吏治¹⁴，刑狱较成哀年间减少了十分之八，与高祖、惠帝时期差不多，但与班固心目中的尧舜之世仍相差甚远。

班固为此积极寻找原因。他认为：“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杰务私，奸不辄得，狱犴不平所致也。”¹⁵并提出了应对方案：“言制礼以止刑，犹堤之防隘水也”，即《尚书》所言“伯夷降典，哲民唯刑”。意思是，倘若不兴礼教，不除五疾，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狱刑所以尤多的状况。

从《刑法志》这些惊心动魄的言论中，可以感受到班固敏锐而又深刻的洞察力。在篇章末尾，班固借引《诗》《书》“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寄予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发出了对统治者施行礼义仁政的强烈呼吁。班固以忠君、爱民、求真、务实等传统道德作为儒者的立身之本，在身为儒家学者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下，《汉书·刑法志》具有立德为民的隐性话语体系也就不足为怪了。

《地理志》囊括了远至上古禹划九州，近至成帝元延、绥和年间的全国疆域和行政区划，还有人口户籍、山川河湖、风俗特产，均条清缕析，纲目分明。从篇章结构来看，均是先述各郡建置沿革、户口统计，而后逐一列举所属各县，载明境内的山川泽薮、仓储、水利设施、历史文化遗迹、要邑关隘，以至物产、工矿、垦地亩数等等。总计记载郡国一百零三，辖县一千五百七十八。数据十分精确，无不包举靡遗，而且不乏饶有卓识的分析，形成了许多独辟蹊径的观点，不仅对了解西汉历史，而且对于阅读先秦典籍、了解上古历史和文化遗存同样弥足珍贵。更重要的是，《地理志》文本富赡，被誉为“集当时全国性地理著述的大成”，折射出恢弘的大汉气象，展现了班固开阔的视野。

应该说，《地理志》中对西汉开疆拓土、功倍于前的相关记录，不仅是班固出于记录疆域变迁的需要，更体现了意欲通过与东汉国力蒸蒸日上遥相呼应，以此来“宣扬汉德”的政治意蕴，还有借其所反映的人事变迁来表达时代变动不居、功业事在人为的积极入世精神。这种把横向叙述西汉当日的地理区划与纵向记载历史遗迹有机结合的著述手法，可谓独运匠心。

再看《艺文志》。“艺文”之名，系班固首创，“艺”指称儒家经典，“文”包括诸子、诗赋和其他所有著作。“艺”冠于“文”前，表示儒学地位崇高；二者合称，即指以儒家经典为主导的现有全部典籍的总著录。《艺文志》是班固在刘歆《七略》的版图上删节而成的，现已为定论。只不过，前人多视班固此举为“删窃”，认为班固除了将《辑略》改为《艺文志·序》之外，其余基本不变。此种观点有失偏颇。采撰是治史的基本方法和优良传统，班固此举无可厚非，何况《艺文志》对《七略》著录的一些书籍在内容、排序等不妥处进行了变更和修正，做到了

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是推陈出新之举。这些补正和创新,都为《艺文志》成为后世官修目录的典范打下了良好基础。

《艺文志》的撰成,是在汉朝空前统一局面下,为应对传世典籍数量的不断增加、文章事业发展要求的不断提高,班固通过多次大力对文献搜求、整理而作出的一次官方总结。《艺文志》作为一部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效的学术著作,既是呼应时代要求之作,也与班固“整齐百家杂语”的学术标的暗合,鲜明地体现了班固的撰述理念。班固虽然明言是对自古至今的传世书目进行一次整理归纳,却将光武帝“钦命”的图讖摒弃不载,显然与当时的庸俗儒学和妖妄之说相对立。即使对早已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的儒学,班固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其渐趋庸俗化、与治学本质相乖离的不良倾向。班固指出,倘若放任自流,便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

此外,班固还在“六艺类”总论中,对当下俗儒大搞繁琐主义的恶劣倾向给予毫不留情的批评,深刻揭露了公孙弘等打着儒学旗号沽名钓誉的丑恶嘴脸,再次强调了儒家六部经典对于治理国家、维持社会伦理、加强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此举不失为对时下支离破碎的解经之风的一种拨乱反正,体现出班固作为一名皇家学者为统一思想、矫除俗儒哲学所作的努力。

前已提及,班固在《艺文志·诸子略》中将先秦诸子分为九流十家,是一种学术分类的自觉行为。在汉代独尊儒术的政治背景下,班固并没有忽视儒家以外的诸子学说,而是在尊儒的大前提下,对诸子百家作适当的肯定¹⁶,提出促进发展的相关建议¹⁷。在此基础上,班固推出了“诸子出于王官”说,即学术的源头是与治理国家人民的公共职务相联系。这恰恰体现出,班固的思想与董仲舒的严重偏见和文化专制态度相对照的明显不同,前者更多地持有尊重历史的态度和朴素理性的观点,同时这些观点对于拆穿东汉俗儒学的神圣面具、回归先王之道发挥重要作用,体现了班固作为学者的强烈责任感,也再一次证明作为东汉思想权杖的儒学正统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

《五行志》是《汉书》“十志”中最具争议的篇目。过去一直被视为妖妄迷信之说,批驳者众多。今天对于《五行志》的文本解读,就要站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立场上,充分认识到班固在书中体现出的朴素理性主义的文化价值所在。《五行志》的内容安排,集中体现了班固的思想光辉。他采用结构分析法,将《五行志》中近四百个案例条缕析:每一条灾异记录都按照“灾异+人事”的格式书写,且被归置于四十六种类型,人事也被描述成因君主不同程度的行为失范而导致不同层面的社会失序。这些灾异和人事都可以置于五行结构中,最后再根据对应机制一一得到对应。这样一来,《五行志》不可不谓向世人提供了一份如何将灾异与人事进行标准化对应的样本。

班固之所以采用此种声东击西的书写策略,实有自己的考量。早在西汉时期,统治者在调整社会管理策略的同时,就经常寻求超自然力量的有效协助。直至儒家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和上帝信仰等观念来改造传统儒学,从而建构起上天、天道、圣王、贤人互为一体的神圣政治秩序,同时儒者自身也被塑造为“天道”的传授者的形象。起初这一操作确是出于避免社会危机、控制社会秩序之目的,但随着灾异学说的不断发展,原先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约束力量的功能逐渐丧失,最终沦为了利益集团斗争的工具,从而一度造成社会文化层面的失序。

班固创作《汉书》之际,恰恰处于以阴阳五行为主导的灾异学说操纵儒学甚至超越儒学的文化背景之中,且其力量已经渗透进社会上的各个角落。所以,班固自觉将朴素理性主义精神注入《五行志》文本之中,希望以史著的形式来对时下文化领域出现的不良倾向予以修正,廓清鬼神迷信的思想浊流,维护儒学本质,为东汉浑浊不堪的意识形态注入一股清流。

综上所述,班固新增“四志”既是随势而变的举动,满足

了统治者“汉承尧运”的政治期待,也饱含着对汉王朝的感激和诉求,“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况且,班固又是一位自幼服膺儒术的学者,希望借撰写《汉书》达到“上下恰通”“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¹⁸的目的,体现大一统王朝思想领域的风貌。因此,新增“四志”集中体现了班固著史一隐一显的双重目的,还意外地达到了保存文献、发扬学术之功用。

三、新增“四志”的作用和影响

班固以前的史家通常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即记载历史事件、人物是以朝代为终始,而有关社会生活的内容却往往是上下贯通、不可分割的前后关系——这就会造成史书形式与内容的剥离。班固著史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很好地解决了其中的难题。他别出心裁创造的典志体,巧妙地达到了“通古今”¹⁹的效果,是对史书形式的灵活运用,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并且起到了有效保存文献的作用。可以说,“四志”能够流传至今、且被历代官修史书沿用,其意义非同一般。

在《刑法志》中,有效保存了各朝法律发展的史料。以后各朝的正史²⁰都继承了在通史中另辟法律史栏目的传统,故都撰写了《刑法志》,对于如《后汉书》《三国志》等个别没有《刑法志》的史书,也通过《晋书·刑法志》和《隋书·刑法志》等做了补充。而且,《汉书·刑法志》中体现的始于西汉、儒法合流的法律思想,也被后世《刑法志》所继承。其中,诸如以民为基、仁义为本、礼刑互用、复礼慎刑等各项法律原则,也为中国古代法学思想的丰富做出了贡献。

再说《艺文志》。作为现存最古老的图书目录,《艺文志》在叙录、分类、著录及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都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奠定了良好基础。第一,《艺文志》载录了当时流传可见的书籍,为文化史的研究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史料,此为保存与传承中华文化之一大功。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例》赞曰:“今欲求周秦学术之渊源,古昔典籍之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焉。”第二,所形成的标准著录法,即先著书名篇(卷)数,再视情况在书名下加注,这些注释实为后世解题体目录的滥觞。现代文献著录中各种项目,除题目与责任者项在正文中标出外,其他各项如版本项、出版发行项、附注项等,皆可从中寻出端倪。第三,《艺文志》所创的分类法深刻影响了后代著作的分类。如王俭《七志》分典籍为《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术艺》和《图谱》七类,另立《佛经》《道经》各一卷,七类对《艺文志》各类或有因袭²¹。又如南朝齐梁时人阮孝绪作《七录》,其内外篇亦与《艺文志》各类相似²²。特别是继《艺文志》开创了中国传统目录学进入正史的先例后,历代史书踵续其风,进一步推动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事业的发展,尤以《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为最。

相较于《汉志》,《隋志》体现出了明确的修目意识。它以《汉书·艺文志》为基本依据,参照郑默《中经》以下各种目录分类法,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严密体系,非常简洁、直观地揭示了各类书籍的不同主题,正式确立了四部分类法,一直为后世所沿用。而且,《隋志》还通过统一书名、统一注体,达到了编目体例的整齐划一。该书在细类的划分上,取资于《七录》最多。可以说,《隋志》在对《艺文志》的继承中实现了超越,是一部后出转精的目录学著作,其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精神的理解和发扬,对后代学术发展具有巨大的引领作用,被视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成熟的标志。因此,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目录类例之沿革》中,对从《七略》到《隋志》这一目录学上意义重大的变革给予中肯评价:“合而观之,七略之变而为四部,不过因史传之加多而分之于《春秋》,因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渐少而合之为一部,出数术、方技则为五,益之以佛、道则为七,还术数、方技则为六,并佛、道则复为四,分合之故,大抵在诸子一部。互相祖述,各

有因革。虽似歧出枝分，实则同条共贯也。”²³

若论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增“四志”中的《五行志》当首屈一指。首先，《五行志》保存了大量诸如奇异的天气现象、生理、生命现象，还有关于天文、地震等自然现象，以及冶炼事故的记载，堪称一部自春秋至西汉末年我国自然科学技术史的资料汇编。而且，这些记录绝大多数与近代学者的推算结果完全符合。

其次，《五行志》的编撰体例和方法对古文献学亦影响深远。《五行志》每记一事，因诸家之说各异，故数说并存于记，而又别其先后，以列于前者为正说且多见于本传，列于后者聊备一解。此实班固以己意折中之，不想却为后世历史记事和历史考证方法的兴起和完善起了一定的发凡起例的引导之功。需要注明的是，班固存留异说并非随意采摭，为避免芜杂和重出，也作过一番甄别和取舍。而且，班固对于夏侯始昌学说的源流考辨，为后世学者对于《洪范五行传》真实作者的考证提供了详实资料。

再次，《五行志》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更丰富的社会风俗和思想的研究史料。其中对汉儒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一番精心整理征引，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西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儒学名家对于天人感应和天下大一统等问题的推演和学说，从而为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汉代新儒家学说乃至汉代思想史提供了有力佐证。

就科学价值而言，《汉书·地理志》其实丝毫不逊于《五行志》。作为我国“正史地理志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地理志》首先提供了关于先秦至西汉王朝疆域政区的大量资料，从中不仅可以了解西汉王朝的整体情况，更可以与后史《地理志》比较对读，从而理清各朝代政区、地名等演变情况，属历史地理学范畴。其次，《地理志》中关于山川草木的记载，尤其是关于河流的相关记载，为考察古今河道变迁、自然地理环境演变及地名变化提供了史料，还为今日环境治理提供了依据。此外，班固在《地理志》中记载并评价了全国各地的民风民俗，对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学科发展均有所裨益。最后，由《地理志》还可发掘一些文学素材，可与《诗经》《楚辞》甚至其后的方志相印证，通过研究地理环境下文学观的变迁及异同，促进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分析。

《汉书·地理志》虽有部分内容继《史记·河渠书》而来，但在内容详实方面更胜一筹。即便《地理志》并非专论沿革地理的著作，但是由班固所首创的记载方式——不仅记载当时的地理，而且兼记以前各代的沿革地理——因此对后世影响颇深。后来在方志的撰述中，始有以建置沿革为篇名的，如传世的《三辅黄图》，开篇之后便以《三辅沿革》为标题。更重要的是，班固首开后世官修史书撰述《地理志》之风：《后汉书》中有《郡国志》，《南齐书》设《州郡志》，《魏书》命名为《地形志》，《新五代史》称《职方考》等。虽历代名称不尽相同，但体例内容几无差别。

四、结语

《汉书》作为继《史记》之后官修正史的第二次伟大尝试，编写过程虽历经波折，却无一不体现着国家意志。其取得巨大成功，不仅昭示着东汉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与政治大一统相呼应的胜利，也无声地开启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历史秩序与个人自由的全新局面。新增“四志”，不仅扩大了典志体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范围，而且其中包含有真理的因素，为多视角反映历史提供了有益参考。

《汉书》新增“四志”的创举，蕴含着双层主旨：一方面，与东汉王朝对于思想文化方面的强力控制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是班固对于当时大行其道的庸俗儒学的有力反抗，为还归传统儒学而奔走。他以学者广博深邃的视角，选取了研究价值颇丰的文献材料，在以古今之变展现大汉“天命所归”的同时，也实现了他著史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宏大愿望。

通过阅读《汉书》新增“四志”，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为一名学者，班固有自己的是非价值判断，并且坚定不移。而且，正是因为他将自己对儒家“圣王之道”的向往、对汉王朝的忠诚、对班氏家族荣光的珍视，还有对史家直书责任的担当、对学术精神的发扬于一身，才使“四志”文本流光溢彩，成就了《汉书》这部传世文献的不朽地位。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基地本科生课外研究计划资助项目

注：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③ 此为侯外庐先生语，详见《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22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④ 参见《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的记载。班氏先祖可追溯至春秋时期，为令尹子文之后。秦楚之际，被迁至北地以实边。孝惠、高后时期，班氏已经成为北境豪族。成帝初年，班况之女被纳为婕妤，班氏家族跃升为外戚勋贵。

⑤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⑥ 参见乔治中：《中国于西方古代史学得异同及其理论启示》，《学术研究》2007年第11期。

⑦ 具体详见《润色鸿业——〈汉书〉文本的形成与早期传播》，陈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4—77页。

⑧ 表格摘自张昊苏《“文化中国”（第五辑）盛世遗响——〈汉书〉纵览新说》，济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页。

⑨ 《汉书·眭西夏侯京翼李传》赞。

⑩ “汉自武帝建藏书之策，成帝时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参见《汉书艺文志之文体》，《中国文学史》林传甲著，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06版。

11 按《汉志·诸子略》中顺序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

12 冉昭德语。参见《班固与汉书》，见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3 陈其泰《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第233页，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14 史载这一时期，“人有乐生之虑”，“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出处同②。

15（东汉）班固著《汉书》，第450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6 即班固认为“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17 班固所言，对于诸子百家要“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18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

19 《汉书·叙传》。

20 如《晋书》、《魏书》、《隋书》、新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和《清史稿》。

21 七类除《诸子》不改其称外，有《经典》源自《六艺》，《文翰》源自《诗赋》，《军书》源自《兵书》，《阴阳》源自《数术》，《术艺》源自《方技》。

22 阮氏《七录》分内篇四录（《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和外篇二录（《佛法录》《仙道录》）。其中《经典录》《文集录》分别与《艺文志》之《六艺略》《诗赋略》相对应，《记传录》从《六艺略》春秋类独立，《子兵录》乃合《诸子》《兵书》二略而成。

23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48页。